



Maspero

马伯乐汉学论著选译

〔法〕马伯乐 著

佘晓笛 盛 丰 等译

中 华 书 局

马伯乐汉学论著选译

〔法〕马伯乐 著
佘晓笛 盛 丰 等译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伯乐汉学论著选译/(法)马伯乐著;佘晓笛,盛丰等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4.7
ISBN 978-7-101-10101-0

I. 马… II. ①马…②佘…③盛… III. 汉学-研究-法国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5278号

-
- | | |
|------|--|
| 书 名 | 马伯乐汉学论著选译 |
| 著 者 | [法]马伯乐 |
| 译 者 | 佘晓笛 盛 丰 等 |
| 责任编辑 | 孙文颖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4年7月北京第1版
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8 $\frac{5}{8}$ 插页3 字数360千字 |
| 印 数 | 1-2000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0101-0 |
| 定 价 | 68.00元 |
-

序 言

葛兆光

—

1944年7月，法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还在沦陷中的巴黎艰难地从事他的中国学研究，他十九岁的儿子却为反抗德国法西斯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27日，在完成一次极其危险的任务时，不想被盖世太保追踪，他虽然机灵地逃脱，但是，盖世太保却发现了他的姓名和住址。第二天，当法兰西学士院的碑铭与美文学院将要举行周会时，学者们发现，院长马伯乐却没有来，因为在这一天早上，马伯乐和夫人一道被德国人逮捕。

文雅的学术在粗暴的权力面前，没有任何抵御的力量。被捕后的马伯乐被关押在巴黎附近的一所监狱，半个月后，在德国人转移货物的最后一辆火车上，他和七十多个难友一道被押送到德国，五天后被送到布汉瓦尔德的集中营，他们穿着从死囚身上剥下来的衣服，饥寒交迫，在冬日的严寒里被迫进行各种劳动。1945年初，也就是被捕七个月之后，他

终于病倒了，拿惯了笔的手已经握不住十字镐，在书斋里深思熟虑的大脑经不住纳粹的摧残。据说，有一个人曾经在马伯乐的最后一刻见到他，在集中营里的地下，消瘦憔悴的学者尽管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但还是兴致勃勃和朋友谈起远东的经历。3月中旬的一天（一说15日，一说17日），这位对东方语言、历史和宗教都有着出色研究的学者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这时，离美军解放布汉瓦尔德，仅仅差一个月^[1]。

这是一个学术史上的悲剧，也是一个中国学领域中难以估计的损失。马伯乐没有坐在书桌旁，却倒在法西斯集中营里，这使得法国的东方语言、宗教和历史的研究，少了一个卓越的领袖人物。在法国的中国学家中，马伯乐堪称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据戴密微给他写的传记说，他出身在一个学术世家，他的父亲是埃及学家，他的哥哥是越南历史研究者，他曾经在河内的远东学院研究多年，其间到过中国考察，然后他向著名的中国学家沙畹学习。他的研究领域很宽，仅仅在这部译文集中，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研究不仅涉及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宗教，也涉及中国古代的地理和历史，而且还涉及了东南亚的历史、风俗和语言。

二

我没有能力全面评价马伯乐的研究，这里主要是从我稍熟悉的道教研究领域说一些感想。我最早接触马伯乐的著作，就是因为研究道教史。他关于道教的历史、道教的神

祇、道教的技术方法的研究,可以说,开创了道教研究的新局面,而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戴密微(Paul Demieville, 1894—1979)于1971年整理出版马伯乐的长篇巨著《道教和中国宗教》(Le Taoïsme et les religions chinoises),更是影响了一代道教教学者。

在早期有关道教研究的领域中,如果简略笼统地说,那么,日本学者的长处在于文献,中国学者的长处在于历史,而法国学者的长处是对佛教和道教的宗教性和历史性的综合把握。法国人对于道教的现代学术研究兴趣,也许可以追溯到1911年魏格尔编制的《道藏书目》(Le Canon Taoists)和1919年沙畹关于泰山投龙简的论著,尤其是后者,这部以“投龙简”为中心的研究论著,关注到了道教人物、经典和思想之外的仪式、方法和政治背景,显示了综合传教士传统、欧洲历史学方法和现代人类学意识的法国道教研究的特征。不过,真正使法国学界对中国道教的研究形成新典范的人物,却是马伯乐。当20世纪头二三十年,日本的妻木直良、小柳司气太、常盘大定,中国的傅勤家、许地山、胡适、陈寅恪、陈垣开始以现代学术方法研究道教史的同时,他却以法国中国学的严谨方法和法国学术界的特有思路,对道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马伯乐从西周和东周的宗教信仰差异开始进入他的论述。首先,他指出西周的时候宗教信仰比如对皇天后土、先公先王和先祖,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东周以后,一来诸侯强大,形成地方性的和类别性的信仰和仪式,二来百家蜂起,各

自将信仰如鬼神等等理性化,反而对神秘力量的崇拜成为边缘和下层,大行于民间,并成为后来道教形成的资源。其次,他介绍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各种神鬼谱系,最高神如玉皇,自然神如雷、电、水、火,管理地方之神如五岳、城隍、土地、灶君,职业神如孔子、关帝、天后,个人休咎之神如北斗、观音、财神、瘟神,死后世界诸神如阎王、地藏等等。他觉得,中国神鬼世界的特点是与人间世界相仿佛,是帝王政治的影像和模拟。接下来,他讨论了古代中国和近代印度支那半岛上泰族的社会和宗教,这一部分显示了他对印度支那历史和文化的熟悉,也暗示了他对古代中国研究的一个取向,一是要扩大中国研究的背景,因为很多中国的东西都和周边有关,二是要用另一空间现在还存在的田野资料,印证此一空间已经消失的历史,三是对于道教史有宏观的把握。而下面几章,就集中讨论了道教史,道教的起源、道教的历史、修炼、仪式。最后的“西历初几个世纪的中国道教”一章,是在马伯乐遗留下来的大量讲演稿、笔记和卡片中,由戴密微整理出来的,它不仅涉及了道教的神、道教的组织、道教的仪式和佛教与道教的关系等等,而且,后来道教研究领域的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其实,在他这里都已经开始讨论了。

三

马伯乐的成就当然不止是道教的研究,当年高名凯教授在他去世以后介绍他的短文中曾经说他,“学问渊博,于中国

古史、语言、宗教、天文、哲学、术数无不精通，所著《中国上古史》(La Chine Antique)曾获儒莲奖金，《唐代长安方言考》(Le Dialect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实出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之右”，这里提到的《唐代长安方言考》，已经由中华书局翻译出版，这很体现欧洲学界当时综合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路数，也让我们了解，何以中国当时最好的研究所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这部译文集里，还收录了当年冯承钧翻译的《汉明帝感梦遣使求经事考证》和新翻译的《道教与中国佛教初兴》，反映了当年道教史研究总是与佛教史研究相互纠缠的状况，早期欧洲和日本道教研究，常常是因为研究汉魏六朝佛教，不得不讨论佛道交涉，而促进了道教史研究的；这部译文集里还收录了关于道家、墨家的两篇论文和关于早期天文学的一篇论文，反映了法国中国学家对于中国的理解，希望上溯到“轴心时代”的取向，也体现了马伯乐对于“古代中国”作总体研究和把握的勃勃雄心；而《公元前四世纪的齐王编年史》、《汉代敦煌文献》等论文，则体现了法国中国学界，除了像葛兰言那样有一个借助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重新理解和解释中国的新传统以外，仍然有像沙畹这样继承了精通和熟悉文献，从传世典籍与考古文献出发重新发掘历史的旧传统，正是这两个传统的交融，才构成了法国中国学现在的风格；至于《李陈胡三氏时安南国之政治地理》、《秦汉象郡考》、《唐代的安南都护府疆域考》等等论文，不仅体现了他对历史上疆域“移动”的中国的理解，也反映了他对中国研究重视“周边”的印证的思路，当然也让人想到他在越南生活和观

察的经历。

四

六十一岁的马伯乐早早死在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学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书斋学问毕竟抵御不了政治权力，纸的书本也绝对不是铁的枪炮的敌手，“烽火连三月”，就得白发搔更短，“铁骑下长安”，就不得不携妻带子落荒逃，更不必说刀斧加于颈项了，算完一道数学题再从容赴死的阿基米德故事，多多少少有些想象的意味和自励的作用，学者再清高脱俗，也得有一个安全和温饱的环境，战争对于学术就是一场灭顶的灾难。

不过，除了战争的摧残之外，有时候因为某些政治原因的遗忘和忽略，也常常带来学术史的遗憾。虽然在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对于法国汉学就并不陌生，不仅冯承钧曾经翻译过马伯乐的若干著作（当时把马伯乐译作马司帛洛，这里收集了四篇），李璜也曾翻译了另一个和他同时代，有和他颇有瑜亮情结的法国学者葛兰言的著作《古代中国的舞蹈及传说》（此书把葛兰言译为格拉勒，非全译本），但是，后来很长时间内，中国学界对于这些法国早期汉学家的研究却越来越隔膜。隔膜造成了彼此的生疏和忽略，也带来了学术史上的资源短缺和思路滞塞，恰成对比的是，在日本却由于相当多的中国学家对法国的特别好感（很多日本中国学者都曾在法国留学或访问，日本各地有很多类似日法会馆这样的机

构,法国远东学院专门编纂佛教研究著作的《法华义林》编纂处也一直在京都),法国汉学常常是刺激他们学风变化的资源。仅仅在道教研究方面,不仅像吉冈义丰很早就和苏远鸣(Michel Soymie)合作编辑了四册《道教研究》,就是马伯乐的《道教》,经川胜义雄翻译后,不仅被收入风行一时的平凡社《东洋文库》,而且在短短若干年中就印刷了十几版。就连他关于六朝道教合气之术的若干讨论,也由持田季末子翻译为《道教の养性术》一书,1983年由东京セリ力书房出版。我特别注意到,1968年,第一次道教国际会议上法国学者提出了道教研究的一个清单,建议研究重心应当围绕着道院制度、道教与异端、道教与现代化、佛道关系、道教与方术、道教与艺术、道教在政治史上的意义、来世观念、降神术、意识中的幻觉、房中术、道教内的相互关系、思维模式等主题上,事后看来,这个建议显然对后来的日本道教研究界的转向,发生了深刻影响。

学问是一个长久的事情,来自外国的知识,并不是像时装那样越新越好,有时候回头看看早期研究,也会发现一些看似陈旧的论著,却有变新的意味,旧的和新的,有时能够越过时间的断裂,构成学术思路的链接,再读马伯乐的著作,也许就是如此。看看这本书的翻译,也觉得颇为有趣,这里既有冯承钧先生在20世纪上半叶翻译的四篇,也有翻过了一个世纪的年轻学人新近翻译的若干篇,新旧翻译之间,竟然遥遥相距半个多世纪,这让人想到,学术史上也许不仅有持续不断的薪火相传,还有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重新找回中断的

记忆,接续旧有的资源以补上新课的时候。

2007年8月26日

【注释】

[1]关于马伯乐的生平,请参看高名凯《马伯乐教授》,原载《燕京学报》第三十期,见周法高《汉学论集》151—155页,台北,1964;戴密微《马伯乐小传》,许明龙译,载《法国汉学》第七辑,520—533页,中华书局,2002。

马伯乐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

周振鹤

马伯乐(Henry Maspero, 1883—1945)是法国杰出的汉学家。他在中国研究方面的贡献,我们大体可以从戴密微(Paul D mievill )所写的《马伯乐小传》^[1]里看出来。这个小传是在马伯乐去世后不久写的,基本上勾勒出了他在学术上过人的成就。我们由其中可以看到,马伯乐不但对整体的中国上古史有精湛的研究,而且在中国古代的宗教、语言与法律研究方面都有开创性的成果。并且为了研究古史,他还特意做了天文资料方面的准备,其本身就是一项成功的研究。不过大概由于写作时间过于紧迫与篇幅的不足,戴密微所写这篇小传似乎还不足以将马伯乐的学术贡献全部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还需要更加详细的马伯乐的学术传记,我不知道法国或中国有人做这个事没有,但我相信这样的工作在学术史上是很有意义的。

今天我们当然可以很自由随便地谈论著名法国汉学家

的成绩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当1962年,商务印书馆打算重印冯承钧先生所译法国汉学家关于西域南海史地考证的论文时,还不得不在序里说:“20世纪初期是法国‘汉学’极盛时代。这些资产阶级‘汉学家’利用比较丰富的语言学知识,研究我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当然,这种研究的目的,还是直接或间接的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的。在这些论文中,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于古代中国与西域南海关系的历史发展,和西域南海国家在世界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提出科学性的阐述,有时甚至还臆造出舛谬的结论。”这些话显然是言不由衷的,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不得不不说的一些表示政治立场的带保护色的话语。

而在四十年之后,我们能够对西方汉学家的功绩做一个比较合适的评价,而不必有其他的顾忌,这是学术史上的一个进步。应当说,法国汉学家在汉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有特殊意义的。1814年12月11日由法国政府在法兰西学院设立,而由雷慕沙(Alel Rémusat, 1788—1832)主持的汉语与鞑靼—满语言与文学讲座是现代汉学产生的标志^[2],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在此之前的所谓前汉学时代,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也是西方传教士中对汉学有突出贡献的代表。就以史学著作而言,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735年出版于巴黎的《中华帝国全志》,冯秉正(J.-F.M.-A. de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在1777—1783年间出版于巴黎的《中国通史》都是重要的里程碑。而在汉学讲座设立之后,法国更是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汉学家,雷慕沙之后的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马伯乐、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戴密微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在很长的时期内,法国汉学在西方汉学界始终处于执牛耳的地位,一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在此我不想对西方汉学的发展历程做过多的评述,只想提出一个不成熟的看法,那就是我以为在1815年初汉学讲座正式开始以后的汉学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汉学是学习介绍型的汉学,也就是西方的汉学家通过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献,了解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并将中国的有关文献以翻译的形式介绍给西方读者。这些翻译往往要加上一些必要的注释,如沙畹对《史记》的翻译。这种介绍还包括对中国现状的介绍,这一方面英美的汉学家做得较多。这一时期的汉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汉语与欧洲语言对照的双语词典与汉语语法书籍以及其他工具书^[3]的编纂出版,这也是为了学习汉语文献与了解中国的需要。第二阶段的汉学则是研究型的汉学,因为新的一批汉学家在语言能力方面已经大大超越于前人,他们中许多人亲自来到东方、来到中国,对中国的语言、历史与文化的了解都比前人深刻。他们能与中国学者同步,不但用中国传统的考证手段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而且还以语言知识为武器,对中国学者不能解决的某些问题做出了解答。在法国这方面可以伯希和与马伯乐为代表,他们的研究论文与中国乾嘉时期的考证文章可以说没有实质性的分别。

这两个阶段的划分只能说是大致如此,因为在前一阶段,也有出色的研究成果,如儒莲的关于语言学的论文。汉学发展这两个阶段的转换期,大致可以《通报》的创办与法国远东学院的设立之间这段时间为标志。如果我们按年代与师承关系细分法国汉学家的谱系,似乎可以认为伯希和与马伯乐、葛兰言是第四代汉学家,由他们上溯,沙畹是第三代,儒莲^[4]与巴赞^[5](Antoine Bazin, 1799—1863)、毕欧^[6](Edouard Biot, 1803—1850)是第二代,而雷慕沙则属于开基的第一代。雷慕沙利用天主教传教士的汉学遗产(天主教传教士并不以为自己为汉学家,但他们确有杰出的汉学成就,限于篇幅这里不能细说),主要是语言学方面的成果,尤其是他们所编辑的法语与汉语、满语对照词典,是语言教学的基础。第一代人与第二代人没有到过中国,从第三代人沙畹起有来华的经历,至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留有与沙畹来华有关的档案^[7]。至于第四代的伯希和与马伯乐则对中国异常熟悉,无须赘述。

我本人可能对马伯乐有特别的崇敬,因为我认为他聪明过人,天赋很高,既能在很宽广的学术领域内驰骋自如,又能在某个专门课题上深入极致,解决他人无法处理的症结。不过在中国,马伯乐的知名度远不如伯希和。我查了一下中文网上的资料,马伯乐的引用率不足伯希和的十分之一,这当然因伯希和与敦煌文献的特殊因缘有关,但即使从学术角度而言,中国学者对伯希和的了解也远过于马伯乐。这也是我想谈论马伯乐的原因之一。据戴密微所编的《马伯乐著述年

表》，他的著述包括论文、专著与书评在内，有 180 种，未出版者尚有十数种，可以说是一个多产的学者。但这些论述都分散在各种学术刊物与各种论文集中，搜集不易，似乎在法国也没有马伯乐的汉学论文集出版^[8]。而且马伯乐的汉学论文译为中文的很少，冯承钧先生译了五篇^[9]，陆侃如也译过一篇^[10]。中国人通法文者少，尤其是历史学家，难怪乎中国学人知道马伯乐的很少。最近，汉学的研究成为学术热点，有学者正在主持一本马伯乐著作的翻译文集，希望能引起中国学者对这位杰出的汉学家的注意。

马伯乐在汉学的许多领域都有成就，在《马伯乐著述年表》中，除了许多正式论文以外，他所写的书评，还关注到世界各国的汉学研究与中国学者的新著作，对许多著述发表自己的评论，例如对郭沫若的甲骨文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都有批评。另外，他对近代中国也予以注意，如对江苏南部的近代宗教也有评述。但我要强调的，主要是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由于外国学者从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者不多，很难理解其中的艰辛，即使是中国学者，若不研究这一专业，也很难领略地理考证的难度。我曾在巴黎亚洲学会图书馆里徜徉良久，翻阅过存放其中的马伯乐的手稿与他在越南所搜集的宝贵的文献，不禁令人思绪万千，因为我就像看到一个睿智的学者正在为我们这些后来者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我今天在这里想说的一个难题就是有关中国历史地理方面的，或许可以看作是对《马伯乐小传》一个小小的补充。

马伯乐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起源于他对越南历史地理的

研究。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越南的北部与中部地区都是中国中原王朝的直属领土,纳入郡县制的范围内。两汉时期该地区被分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延至唐代,虽然越南中部地区已在中原王朝统治范围之外,但北部地区仍由安南都护府管辖。直到五代时期,吴权自立为王时(939),越南才获得独立(明代虽然在越南北部建立过交趾布政使司,但只是昙花一现而已)。马伯乐因为研究越南历史与地理,进而研究唐代安南都护府,更进一步接触到秦汉时期的象郡问题。在历史地理方面他的论文有以下几篇已经译为中文:《李陈胡三氏时安南国之政治地理》、《宋初越南半岛诸国考》、《唐代安南都护府疆域考》与《秦汉象郡考》。

前两篇关于越南的历史地理暂且不提,第三篇是有关唐代地理方面的,这是一篇未完成稿,很可惜。但就其整体考证规模与已完成的部分考证,可以看出他所使用的方法与中国的所谓朴学方法是一致的。马伯乐充分地掌握了中国与越南的文献资料,虽然越南方面的文献于此题目没有任何意义,但他仍说明其无用的道理。他用来作为考证的基本文献是新、旧《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志》与《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在他已经考证清楚的红河平原的几个行政区划,即交州、峰州与长州及其所属县,均正确合理,基本上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相一致,但还加上了一层亲切感,因为他到过这些地方。

不过,马伯乐最出彩的历史地理研究文章却是篇幅不长的论文《秦汉象郡考》,因为这篇论文基本上解决了秦汉时代